

#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普列汉诺夫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普列汉诺夫著

刘若水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Г. В. Плеханов  
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本書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译出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普列汉诺夫著

刘若水译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5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50×1168 公厘  $\frac{1}{32}$  · 2  $\frac{1}{2}$  印张 · 字数53,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定价(7) 0.30 元

统一书号 3002·42

校对者：杜成之

統一書號：3002·42

定 价： 0.30 元

## 序 言

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可能引起許多誤会或者甚至許多不滿。同情“土地与自由”<sup>1</sup>和“黑土重分”<sup>2</sup>(这些都是我参加过編輯工作的机关刊物)的方向的人,可能責备我,說我放弃了所謂民粹主义的理論。我們革命党的其他派別的拥护者們可能不喜欢我对他們所珍視的一些观点的批評。因此,我認为,事先稍作說明并不是多余的。

在民間工作和为人民工作的志向,認为“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身事業”的信念——我們的民粹派的这一实际的傾向,我还是同从前一样地珍貴。可是它的一些理論上的命題,我認为在許多方面确实是錯誤的。在国外居留和对社会問題注意研究的那几年,使我深信,人民自發运动的胜利,有如拉辛的暴动,或者德国的农民战争,不能滿足現代俄国的社会—政治的各种需要,我們人民生活的一些陈旧形式在其自身内部已含有自己瓦解的許多萌芽,而且沒有强有力的和組織得好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对这些萌芽直接起作用,它們是不能“發展到高級的共产主义形式”的。所以我以为,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同时,俄国革命者至少必須竭力培养出一些要素,准备将来創造这样的党。在这一創造的活动中,由于必需,他們不得不轉到現代社会主义的基地,因为“土地与自由”的一些理想是和產業工人的

情况不适合的。而且当俄国特殊的理論变成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語，而俄国社会的进步因素集合在深思的“西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时候，这在現在是很适时的。

我現在轉到我要說明的另一点。在这里，首先我要为自己辯护，我所涉及的不是人而是一些意見，我同这一或那一社会主义小組的一些私人的分歧意見絕不减少我对一切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誠实战士們的尊敬。

此外，所謂恐怖主义运动在我們革命党的發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对政府进行自覺的政治斗争的时期。在我們的革命家們中間的这种方向的变換使他們对从以前一个时期承繼下来的一切見解有重新审查的必要。生活要求我們在进入新基地时重新审查一切我們的知識，而我把自己的小册子看作是对这一在我們革命文献中很早就已开始的批判工作的量力的貢獻。讀者大概还没有忘記热里亚波夫的傳記<sup>3</sup>，它里面含有对“土地与自由”小組的綱領和活动之严厉的、而且常常是極真实的批判的評价。很可能的，我的批評的嘗試或許不大成功，但是如果說它不大及时，怕不見得公道。

格·瓦·普列汉諾夫

日內瓦，1883年10月25日

## 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卡尔·馬克思<sup>4</sup>

从俄国革命运动最后走上对专制制度公开斗争的道路的时候起，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的問題就成了我們的党最现实的、爭論最热烈的一个問題。因为这一問題，为多年来共同实际活动所联系起来的人們的意見就有了分歧，因为它，許多小組和团体都解体了。我們甚至可以說，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暂时地分成了两个陣营，对“政治”抱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正如在类似的情形下經常發生的那样，事情难免不走到極端。有一些人認為政治斗争几乎就是背叛人民的事業，是我們革命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一些資產階級本能的表現，是对社会主义綱領的純潔性的褻瀆。另一部分人不仅承認这一斗争的必需性，而且也准备为了它的所謂利益去和我們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們作一些妥协。有些人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認為俄国階級对抗的任何表現对于現時都是有害的。例如，热里亚波夫就抱着这类观点，他認為，如他的傳記的作者所說的，“俄国革命不单单是农民的解放，或者甚至(?)不单单是工人等級的解放，而是全体俄国人民的政治复活”。\*換言之，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在他的認

---

\* 見小冊子“安得烈·伊凡諾維奇·热里亚波夫”，第10頁。

識中是和工人階級爭取經濟解放的社會—革命運動合流在一起的；現時局部的、特殊的俄國任務掩蔽了所有文明國家的工人階級的一般任務。比這一分歧走得更遠是不可能的，於是分裂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時間漸漸使各走極端的意見趨于緩和，使大部分爭論的問題解決得雙方都認為滿意。逐漸地，一切人或幾乎一切人都承認，已開始的政治鬥爭必須繼續到人民和社會中廣泛的解放運動摧毀了專制制度的大廈（如像地震摧毀鷄籠）那個時候，如果可以應用馬克思的有力的語句的話。但是在我們的許多社會主義者看來，這種鬥爭直到現在好像是某種不得已的妥協，是“實踐”對“理論”的暫時勝利，是生活對無力的思想的一種嘲弄。“政治家們”本人，在為自己辯護而來反對那些紛紛落在他們头上的責難時，避免訴之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可是卻又引証現實之不可抗的要求。看來，在靈魂深處，他們也深深地相信，自己不完全和政治的趨勢相稱，但是可以以如下的想法安慰自己，就是說，只有在自由的國家他們才能讓死氣沉沉的人埋葬自己的死者，在和政治最後清算以後，才能全心全意致力於社會主義的事業。這一模糊的信念有時候引導到一些可笑的誤會。在分析“俄國客人”在庫爾大會<sup>5</sup>上的演說，並企圖為自己辯護以反對所謂政客手段的責難時，“民意”順帶也指出，它的同志們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政治急進派，而只是“民意黨人”。<sup>6</sup> 恐怖主義者的機關刊物認為，在“西方”急進黨人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政治問題上面，而社會主義者，相反地，卻對“政治”一點也不願意聞問。凡是知道西歐社會主義政黨的綱領的人，都當然理解，這一對於他們多數人的這種認識是錯誤到怎樣的地步。大家知道，歐洲



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从来没有拥护过“不过問”政治的原则。它们的同志们并不忽视“政治”。他们只是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看作“全体人民的复活”。他们竭力组织工人成为特殊的政党，把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分开，给经济的对抗以政治的表现。至于我们这里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为条件的这个信念，这一与现实完全矛盾的信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席勒的戏曲中的瓦倫斯坦对马克思·皮可洛明尼說，人的智慧是广阔的，而世界却是狭窄的，所以思想在前者里面容易协调，而事物在后者里面则尖锐地互相冲突。<sup>7</sup> 我们关于自己是否应当說，一些在实际上不仅十分协调，而且一般地說在相互的联系之外就不可思議的事物，有关它们的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反而不能和平共处嗎？为了回答这問題，我们首先必須把我们革命者們中間在一些政治倾向發生的时期就已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那些观念弄明白。既認清了这些观念是錯誤的或者落后的，我們再看一看，那种連资产阶级的敌人們都不否認其名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說对于政治斗争給予以什么地位。在这以后我们就只有在我們的一般結論中作出作为适应現代俄国现实的这些或那些特点所必須的一些修改，于是我們的主题就将談完了；工人阶级与属于这一或那一历史形态的敌人們的政治斗争，将在我們之前完全显露出其与社会主义一般任务的联系。

社会主义的宣传对于各文明国家的思想發展的全部进程都产生了極大影响。也几乎沒有一門社会科学，不这样或那样受到这一宣传的影响。它一方面打破了陈旧的学术成見，另一方

面却把它們从幼稚的錯誤变成了詭辯。而社会主义宣傳对于新学說的拥护者們自己,不言而喻,是影响得更加强烈。从前“政治的”革命家們的一切傳統都受到了無情的批評,一切社会活动的方式都以“新福音”的观点加以分析。但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科学論証只是在“資本論”<sup>8</sup>問世以后才完成,那么不言而喻,这一批評的結果远不是时常令人滿意的,而因为,从另一方面說,在空想的社会主义中存在着几个学派,就其影响說,几乎是同等有力的,那末逐漸就形成了某种中庸的社会主义,而拥护它的一些人既不是想建立新学說的人,又不是屬于以前所存在的学說的特別热心的拥护者。如弗·恩格斯所說,“这一折衷的社会主义是从各种宗派的創立者的一些最公認的和最不深刻的批評意見,經濟原理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品發展出来的,它,由于其組成的部分在辯論的潮流中,像石塊在河中一样,愈加迅速磨光其鋒稜尖角,那末这种混合品的造成也就愈加容易。”<sup>9</sup>这同一位作者又說,“这种中庸的社会主义,直到現在还支配着英法两国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头脑”。\*\*我們,俄国人,可以补充說,这样的混合品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恰恰也支配着我們的社会主义者的头脑,而且是所謂“前进派”和“巴枯宁派”<sup>10</sup>两个極端派別从而分化出来的一般的背景。前一派傾向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后一派是第一国际無政府主义集团的俄国版<sup>11</sup>。在这两派之間在很多的問題上,几乎在一切問題上都有分歧,可

- 
- 見“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S. 18. (“社会主义的發展”,第18頁。)
  - (1905年版注)現在在法国,馬克思主义已最后胜利了,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也为若果斯的陣营中的“机会主义者們”所承認,虽說多少带些歪曲。

是說起来也奇怪，而在对“政治”持消极态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而且必須承認，無政府主义者們在这一方面比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徹底。

从無政府主义的观点看来，政治問題是任何一个工人綱領的試金石。無政府主义者們不仅不肯和现代的国家打任何交道，而且从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中排除了足以使人这样或那样地想到国家观念的一切东西。“自治公社中的自治的个人”，这是这一派别所有的信徒們的口号。大家知道，这一派别的奠基人，蒲魯东，在自己的机关刊物“*La voix du peuple*”<sup>12</sup>中为自己提出一个不十分謙虛的任务，即是“对于政府这一观念（他以此与国家观念混淆起来）要抱和康德对于宗教的观念一样的态度”<sup>\*</sup>，而他对国家的热忱竟走到了宣布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国家問題上是一个怀疑論者”<sup>\*\*</sup>的地步。他对自己所提的問題的解决是很简单的，而且是从法国康德的經濟学說中邏輯地得出来的。蒲魯东从来没有把未来的經濟制度設想为不是商品生产的形式，不过这种形式須以在“构成价值”原則上的新的、“公正的”交換形式来修正和补充。在这一新的完全“公正的”交換形式之

- 
- \* 見“*Confession d'un révolutionnaire*”，Préface, p. 4. (“一个革命者的懺悔”，序言，第4頁）。<sup>13</sup>
  - \*\* 亚里士多德“在国家的問題上是一个怀疑論者”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他的“政治学”的第一卷第一章看出，他在那里說，“国家是社会性的最完善的形式”；它的目的是“至善”，所以它是一种“最足以称为自然的現象”，“而人是由自然預定使之依附于社会生活的国家形式的一种动物”（1879年佐塞米尔編，德文版，第一册，第一章，第1—11节）。“政治学”的作者之“怀疑地”对待国家，正和蒲魯东对待商品生产是一样的。前者不能設想有别的更高的社会生活形式，正如后者也想不到有不是商品的形态，而还可以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的产品。

下，它当然不排斥买卖，也不排斥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而發生的債務关系。一切这些行为，当然必須有一些不同的契約为前提，而交易双方的关系即由它們来确定。但是在現代的社会里，“契約”所根据的是一切公民所必須遵守的和为国家所保护的一般的法权规范。在“未来的社会”里，事情一定是进行得稍为不同些。据蒲魯东的意見，革命必須推翻“法律”，仅只保留“契約”。他在自己的“*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sup>\*</sup>中这样說：“不需要那些为多数所通过或全体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公社和組合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特殊法律”（第259頁），在这样地看待事情时，無产阶级的政治綱領便简单化到無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只承認为一切公民普遍和必須遵守的法律，它甚至就不能成为达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社会主义者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国家的时候，所巩固的只是开始“社会清算”时必須根絕的那禍害。国家必須“解体”，这样就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社和組合”有頒布“自己的法律”和締結为它們所必須的“契約”的充分自由。假使無政府主义者不致在“清算”的时期耽誤時間，那末这些“契約”将根据一些“經濟諸矛盾的体系”<sup>14</sup>的精神来締結，于是“革命”的胜利将得到保証。

俄国的無政府主义者的任务还更简单一些。“国家的毀灭”（在無政府主义的綱領中逐漸地占据了为蒲魯东所推荐的国家的“解体”）应当为俄国人民的“各种理想”的發展清除道路。而因为这些“理想”中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和手工業的組合組織占有很显著的地位，那末必須假定，有民主傳統的“自治的”俄国人将不

\* “十九世紀革命中的总观念”。

是根据蒲魯东的互助精神，而宁可說是根据土地共产主义的精神締結契約的。因为“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的俄国人民很快地理解到，只是一个公社占有土地和生产工具，还不能保証所需要的平等，所以将不得不在完全共产主义的原則上組織“自治的公社”。

不过，俄国的無政府主义者——至少是所謂“暴动派”色彩的無政府主义者——是不大思索他們所宣傳的人民革命的經濟后果的。他們認為自己的責任是——按照他們的意見——消除那些妨碍人民生活正常發展的社会条件；但是他們并不問問自己，脱离了外部阻碍之后的發展，将循着哪一条道路进行。而且这种把曼徹斯特学派的著名格言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向革命方向的特殊改造，是排除了对我們社会—經濟生活作任何严肃評价的可能，而且也是使关于它的“正常”發展的概念沒有任何标准——这也是“暴动派”以及后来出現的“民粹派”所沒有想过的。像这样的評价，只要我們的革命家們的議論的出發点仍旧停留在蒲魯东的学說上时，也就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嘗試。这一学說之最弱的一部分，他們的邏輯上的錯誤关键就是关于商品和交換价值的概念，也正是据以只能作出关于生产者們在未来經濟組織中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結論的那些前提。从蒲魯东的一些理論观点看来，当代俄国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完全不排除商品生产的这种事实，是沒有任何特殊重要性的。蒲魯东主义者关于商品生产在其發展的一定阶段，發展为資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內部的、必然的辯証法”沒有一点的了解\*\*。所以他的俄

\* “听其自然”。

\*\* 見“Das Kapital”, 2. Auflage, S.607—608. (見“資本論”，第二版，第607—608頁)。<sup>15</sup>

國同道者也從沒有想到問問自己，“自治的”人們的、一些公社和組合的分散力量，是否足夠同商品生產的趨勢來進行鬥爭，而這種趨勢有一天會威脅着把“正當取得的”資本供給某一部分“天生的”共產主義者，並且會把他們變成其餘居民群眾的剝削者。無政府主義之所以否認國家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創造作用，正是因為他們不理解這一革命的任務和條件。

我們在這裡既不能詳細地研究一般的無政府主義，也不能研究其中的“巴枯寧主義”。\*我們只想請我們的讀者注意如下的事實，就是無論蒲魯東或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當他們把“不干涉政治”提高到成為自己的實際活動的基本教條的時候，從他們自己的觀點看來，是完全正確的。俄國生活的社會—政治結構，好像可以特別證明一切無政府主義者所遵守的否定“政治”的主張是正確的。俄國的“居民”在進到政治鼓動的活動範圍以前，必須變成公民，即是說為自己爭取得一些政治權利，首先，不消說，就是願意想什麼就想什麼，想什麼就說什麼的權利。這樣的任務在實踐中就歸結為“政治革命”，而西歐的經

- 我們只提醒讀者注意瑞欽豪生對蒲魯東所提的反對意見。這一不倦的直接人民立法論的宣傳家說：“權力、政府連同其一切的形式只是所謂：社會在人對物的關係上和在人對人通過物的中介的關係上進行干涉的一種形式。我舉出蒲魯東先生向我說的作為他腦力勞動結果的如下結論：‘我們不需要人對物，以及人對人相互間關係的這樣的社会干涉！’”見“Législation directe par le peuple et ses adversaires”P.194—195，（“人民的直接立法及其反對者”，第194—195頁）。瑞欽豪生以為“像這樣提出問題，就是解答了它”，因為“蒲魯東先生自己也承認這種干涉的必要性”。但是他沒有預見到學生們比老師走得更遠些，而且也沒有預見到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最後將墮落成為“社會無定形主義”的理論。現在的無政府主義者們不承認社會對於個人的任何干涉，而他們在自己的某些機關刊物的篇頁中是屢次這樣聲明的。

驗对所有的無政府主义者明显地“表明”，这样的革命对于人民既沒有带来、也将不会带来和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关于人民必須通过参加自己国家的社会生活来受政治教育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發生的，这只是因为無政府主义者們認為——如我們已知道的——这样的参加不是教育人民群众而是使他們墮落：它在他們中間發展了“对国家的信仰”，因此就是發展了国家組織的傾向，或者，如已故的米·阿·巴枯宁所說的，是用官方的一社会的毒来感染他們，而且，無論怎样，是轉移他們对于現在看来是唯一有益和免除灾难的事業的注意、即轉移对暴动的注意，哪怕这种轉移只是暫时的。”而且依照我們的“暴动派”的历史哲学看来，原来，俄国人民的整整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已經証明了自己有反对国家的傾向，所以可以說是在政治方面是充分成熟的。所以，抛弃任何的“政治把戏”罢！讓我們帮助人民的反国家的斗争，把他們的分散的力量匯合为一个革命洪流——而那时笨重的国家机构将化为灰烬，以自己的崩潰开放出一个社会自由和經濟平等的新时代！我們的“暴动派”的整个綱領已表現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了。

对于俄国革命者各派別的綱領所作的这种簡略叙述，我們不应当忽視弗·亨·雅可畢所表示的那些观点，即“各种宪法”只是魔鬼所干的或多或少的不利勾結，我們說，这样的見解不止是民粹派和無政府主义者所独有的。假如讀者知道弗·恩格斯和彼·特卡乔夫的論爭\*\*，那末，他大概記得，“警鐘”<sup>17</sup>的

\* 見極有趣的和有代表性的巴枯宁的小册子“科学与不可緩的革命事業”。

\*\* 見“Offener Brief an Herrn. F. Engels”（“給弗·恩格斯先生的一封信”）<sup>16</sup>

主編，在和巴枯寧主義者們關於實際鬥爭的問題上雖然意見分歧，但對我們祖國的社會—政治狀況的基本看法卻和他們是完全一致的。他也是通過俄國的特殊性和“俄國人民天生的共產主義傾向”這種偏見來看這一狀況的。<sup>\*</sup> 要是真正的布朗基主義者<sup>18</sup>，不消說，他不否認“政治”，但是卻把政治只理解為一種以奪取國家政權為目的的陰謀的形式。顯而易見地，我們當時的布朗基主義者眼睛里只看見了這個目的，這就使他們遭到了許多矛盾。如果是徹底的話，他們應當承認他們的活動對於進步事業之有益，僅僅只在於他們對於自己的目標的打擊是對准沒有毫髮之差的場合。假使他們所考慮的奪取政權這件事不成功，假使陰謀被破獲，或者革命政府將為自由主義的政黨所推翻，那末俄國人民不僅得不到一點點的好處，而且，相反的，將要遭受很大的損失。特別是，在所假定的後一場合，就會遭到毀滅。自由主義者將成立強有力的政府，對它的鬥爭比對於現代的“權力無限而荒謬”和“荒謬而權力無限”的帝制的鬥爭要困難得多；而“經濟進步的火焰”會摧毀人民生活的根本基石。在它的影響下，交換將發展，資本主義將鞏固，公社的原則本身將被摧毀，總之，時間的洪流將把那賴以很快會達到共產主義天堂的基石沖走。如果失敗，俄國的布朗基主義者就會使人民解放事業遭到可怕的損害，這樣就陷入威廉·退爾拿自己兒子的生命作孤注的可悲處境。但是因為他們沒有神話式的瑞士“叛變者”那樣靈活，俄國人民如果理解了他們（布朗基主義者——譯者）對自己生活的“根本基石”的觀點而且被邀

\* 為了相信這一點，我們只須比較一下上述的“致恩格斯的信”和上面所引的巴枯寧的小冊子



請來對他們的綱領表示意見，他也就會對他們喊出：

射罷！我一點不怕！\*19

這樣狹隘和無希望的俄國歷史哲學當然會合乎邏輯地引到那一可驚的結論，就是說俄國的經濟落后性是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而停滯應當作為我們的“最低綱領”的第一和唯一的一節顯示出來。我們在“警鐘”1875年2月份這一期上讀過這樣的話：“每一天給我們帶來新的敵人，創造新的敵視我們的社會因素，炮火也漸漸接近我們國家的一些形式。現在它們是死氣沉沉的，沒有生息。經濟進步喚起了它們的生命，貫輸給它們以新的精神，提供給它們以直到現在在它們里面還沒有的力量和強壯的身體”，等等。但是假如，據聖經上的故事說，約書亞·納文路能將太陽停止在“第十級”上，那末，奇蹟的時間已經過去，而且沒有一個政黨能喊叫說：“停住罷，生產力，不要動，資本主義！”歷史不注意革命家們的擔憂，正如它不注意反動派的悲嘆一樣。“經濟進步”致力於自己的工作，不等待到無政府主義者們或布朗基主義者們實現自己的意願的那個時候。每一個在彼得堡建立的工廠，每一個為雅羅斯拉夫的手工業者所僱用的多餘的“小工”都在加強好像是對革命有嚴重後果的那種“進步熱情”，因此也就是在減少人民勝利的或然性。難道能夠把對於俄國各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的這種看法稱作是革命的嗎？我們認為，不能。如果要使自己成為實質上而不是名

- \* 這是指席勒的一部劇作“威廉·退爾”中的一段故事，描述十三世紀時瑞士的愛國者威廉·退爾在殘暴的總督蓋思勒的命令之下，要他向離他八十步遠的兒子頭上的蘋果射箭的事，在這樣的距離中要不傷害他的兒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威廉·退爾畢竟做到了。引語中的話是威廉·退爾的兒子華德在他父親遲遲不射出箭時向他父親講的。——譯者